

我的书架上挤满声音

少一



我没有单独的书房,我的书房与卧室是一体的。

2005年,我在县城买了房子,140平方米,四室两厅。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对书有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加上陆续也积攒了一些书,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这才考虑在主卧室辟出一面墙摆上书架。最下面是几组书柜,书柜之上便是开放型的书架,分上下5层,左右4格。书柜比书架宽出15公分,空间自然比书架要大,方便储存更多的书籍。

建成之初,我的书架是骨感的,自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后才日渐“丰满”起来。我的藏书大致分几类:一是文学杂志类,有我这么多年坚持订阅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有我发表作品的各种样刊,含作品入选后的部分选本,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杂志赠刊。这几样加起来,占据的空间已经不小了。二是我购买的书,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名著,国内国外的都有,加上文友惠赠的著作,数量也不在少数。三是我的剪贴本和读书笔记。参加工作

后,每年都会留下一本“笔耕”的成果。这些剪贴本是我生活与工作的记录,是单位的荣誉榜,也成为我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之一,于我而言,它们存在的价值不比任何一部文学名著逊色。另外,我读书不喜欢“裸读”,有做读书笔记的强迫症,从字字句句到思想到艺术创新,只要我感兴趣的东西都会记录在本上留下淡墨。从事文学创作12年,我的“文学笔记”的编号到了“22”。它们见证着我的读书经历,留存着我读书过程中灵光乍现的所思所想,成为我文学创作的灵魂伴侣。所以,这些本本在我的书架上都堂而皇之地有着一席之地。

目前,我的藏书还比较单调,除了几部哲学著作外,都是清一色的文学书。我把它们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排列,在不同类项中自然将同一作者的书归置到一起,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查阅也方便。我以为书房与卧室一体最大的好处是方便主人和书做朋友。读书、写作累了倒头就睡,人和书是朝夕相伴的,醒来精神饱满,或读或写全凭兴致,毫无定规。这样的散淡与随性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好的状态。

书是会说话的朋友,每每走进书房,我都会听到书架上发出的声音。我最早听到它们说:“主人啊,我们太挤了,挤得都快喘不过气来,您能不能给

我们换个稍微宽松的环境啊。”我循声朝书架望了一眼,没错,日积月累,书架上的书的确摆得太满了,紧到我取书时都很费力。可是,房子就这么大,每间各有所用,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唯一能做的是下架一部分书,把它们交给收荒货的老头。我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分旧书,目睹着老头手里那杆冷冰冰的秤,等他称量完毕,心里突然涌起万般不舍的情愫。“慢着。”我从旧书里往回挑出几本,又挑出几本,再挑出几本,最后留给老头的没剩几本。他算来算去,要付给我钱。我想了想挥挥手说:“算了,你走吧。”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梦里又听到书对我说:“其实,你卖掉那些书,我们也觉得挺可惜。主人啊,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于是,我打上隔壁房间的主意,请一家装修公司来家里帮忙设计,拆掉衣柜,把一面墙改装成了书墙,大大缓解了藏书的压力。

有一天,我听到有些书给我提意见了:“喂,主人,您花钱把我们买回来,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吗?我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这意见好尖锐啊!我赶紧把“意见书”抽出来,果然原封未动,连塑封都没拆开。我觉得愧对它们,并由此给自己立下规矩:往后不随便下单买书,做到想读就买,买书必读。现在,我的书架上没读的书不会超过20本,占比少得

可怜。如果把那些重读两遍,乃至三遍的书,比如说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蛙》、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拿来抵减,我才稍感问心无愧。

我还听到了书架上另外一个声音:“主人啊,您不能光读不写呢。您的书架上不能只有人家的书,还得摆上您自己的书,那才好玩呢。我们期待和您的书做朋友。”我感谢它们,心知这是委婉提醒我写作不能患冷热病,要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在它们的鞭策下,我不敢懈怠,每天坚持写一点,多少都要写一点,到目前为止,勉强出版了三本书。

与许多文友相比,我的书房委实有点寒酸,但是它温馨、实用,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况且,我的书架上挤满了声音。每每走进书房,听到它们闹哄哄地交谈,嗅着满屋子书香,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孤独。我认真地倾听,冷静地思考,偶尔也会发自内心地和它们交流一番,然后或读或写,进入忘我之境……

(作者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月光紧追不舍》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

船山学脉与学刊情缘的跨世纪回响

胡代松

者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而撰写的深情之作。他们中既有造诣精深的学界前辈,也有著述宏富的中国史实,还有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既有长期深耕船山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有从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介入船山思想乃至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者。尽管学术背景各异、专攻方向不同,但他们都是《船山学刊》的热心作者和忠实读者,他们都有一份共同的情感——对船山先生和船山思想的敬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担当。

这是一段段令人动容的学刊情缘。多位学者回顾了如何结缘学刊、如何受益于学刊、如何在学刊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经历。有的因学刊与船山结缘,从此坚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学刊是其学术成长的见证者,也是其进入中国哲学研究殿堂的重要向导;有的把学刊当作其案头必备宝典,前辈学人的宏论高见如同灯塔,指引其在浩瀚的船山学海中航行,学刊成为其获取最新研究成果的窗口,更是其感受严谨学风、体悟船山精神的殿堂;有的将与学刊的相遇和交往,视为与船山的跨世代“结心”,由此学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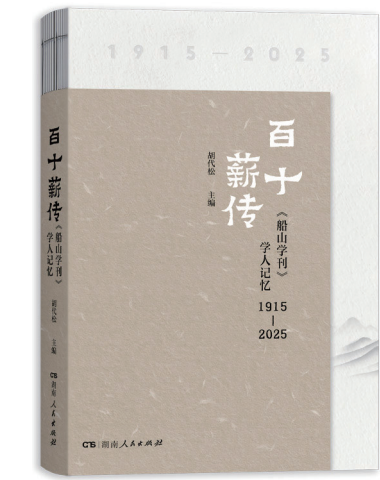
为传承船山学脉的重要平台……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体学术生命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船山学刊》的发展史,还是一部微观的当代船山学术史、传播史。

这是一份份无比珍贵的学术记忆。书中不少学者回忆了自己从不同维度深入发掘船山思想的心路历程。在哲学层面,探讨船山“理在气中”的形而上学建构、“性生日成”的人性论发展、“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和“知行统一”的实践哲学;在伦理学层面,探讨船山建构的“理欲合性”“义利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在经学层面,分析船山对《周易》《礼记》《尚书》《诗经》《春秋》等的创造性诠释;在文化层面,强调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气魄与“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对众多学者而言,船山思想不仅是其研究对象,更是其学术生涯的“精神导师”。

这是一串串掷地有声的时代回响。在多位学者的回顾中,我们得以窥见《船山学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坚持与探索。经过几度停刊又几度复刊的曲折发展历程,《船山学刊》始终坚守学术本位,不随波逐流;它秉持“昌明正学”的初心,倡导严谨学风,扶持青年学人。它

立足湖湘,放眼世界,既扎根传统经典,又开放面对中西对话。不少学者感叹,《船山学刊》始终保持“唯学术是举”的公正品格,不以作者身份地位为取舍标准,真正成了一个既延揽名家又不薄新人的平等、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从这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字中,我们更得以窥见《船山学刊》的时代使命,便是让这一声声回响永远激荡在学者心间,经久不衰,并以此激荡出船山学、湖湘学和中华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气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十载栉风沐雨,数代人薪火相传。本书所汇之文,既是学者们对船山先生和《船山学刊》的深情礼敬,也是学者们对船山学研究及《船山学刊》未来的殷殷期许。愿这段情缘永续,这份记忆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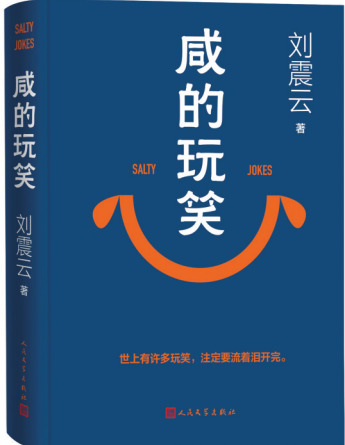
以“研究船山思想,弘扬湖湘文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宗旨的百年老刊《船山学刊》(原名《船山学报》),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从1915年创刊至今,它以赓续中华文明薪火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走过了曲折的110年风雨历程。百十年来,《船山学刊》虽饱经沧桑,但始终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发展,是数代心仪船山思想、弘扬湖湘文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华夏学子及海外学人共同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

《百十薪传:〈船山学刊〉学人记忆》所收录的文章,是来自海内外数十位学

马观书

刘震云开了个“咸的玩笑”

黄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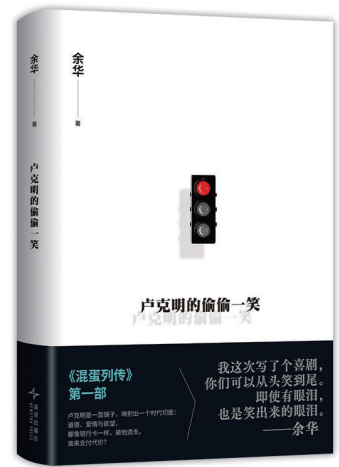
刚刚在湖南文学周上亮相的知名作家刘震云传来好消息。近日,刘震云全新长篇小说《咸的玩笑》正式上市。

《咸的玩笑》延续了刘震云“写众生”的创作底色。主人公杜太白辗转教师、红白事主持人、小贩等多份职业,在生活中摸爬滚打。面对无法较真、有苦说不出的生活磨难,杜太白看清规则却不被规则捆绑,尝过苦楚仍敢热烈投入。

刘震云借“杜太白”这一幽默形象,承载了千万人未被言说的困顿,生活的本质就是变化,变化就带来了起伏。正因为这种复杂性,世界才不断向前滚动。“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说完。”“面对生活的玩笑,我们应当给时间一点时间,因为时间相信的,唯有变化本身。”

余华写喜剧“偷偷一笑”

黄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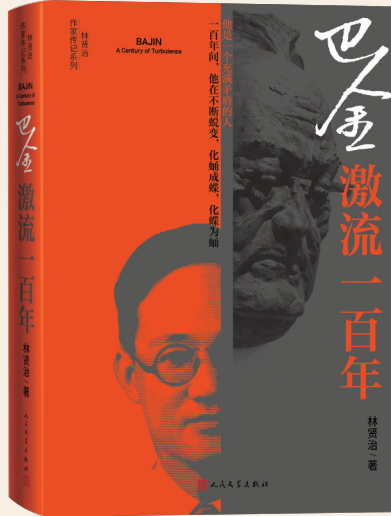
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文城》出版五年之后,余华的新书《卢克明的偷偷一笑》近日已出版。

要说这部新小说与余华之前的长篇小说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这是一部没有死亡、没有“刀子”的小说。用余华自己的话说:“我这次写了个喜剧,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即使有眼泪,也是笑出来的眼泪。”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是一部零距离书写当下社会的小说。故事中有利欲熏心的商人,有操控舆论的网红,有老板和员工,有男人和女人……所有人在利益的漩涡中翻滚挣扎,努力成为留在岸上的那个幸运儿。

主人公卢克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透支”,在他看来,金钱、爱情、欲望,万物皆可透支——这恐怕也是许多浸淫在消费社会氛围中的人们共有的心态。然而,当透支创造了欢愉的假象,是否会有人停下来思考:代价是什么?又是谁来支付代价?这就需要读者们读完书后,自己去琢磨了。

他山之石



黄禾

再现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巴金

在文学的长河中,巴金先生留下了《家》《春》《秋》《随想录》等不朽经典。2025年是巴金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近日,著名学者林贤治的最新传记作品《巴金:激流一百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巴金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不同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他自称是“‘五四’的儿子”,毕生不倦地追求着、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作者林贤治从史料出发,全景展现巴金的百年沉浮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忠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艰难奋斗和思想历程。

作为学者和诗人,林贤治的作家传记写作极具个人风格与思想深度。在作品中,他将巴金的文字与人生历程深度融合,并以克制的笔触客观剖析巴金性格和思想中的矛盾性。书中,一百年逶迤道来,政治、历史、文学、生活相渗透,夹叙夹议,跌宕有致,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图景。

一部精神史,再现巴金从“激流”到“随想”的心灵轨迹

不同于以往诸多聚焦巴金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的传记作品,《巴金:激流一百周年》虽以时间为轴线,却始终围绕巴金精神世界的关键转折展开,勾勒出一条从激情呐喊到深刻自省的精神轨迹,揭示其思想蜕变与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历史的深入互动。

本书突破了以往传记对青年巴金思想轨迹研究不足的局面,直面巴金的思想复杂性,将其青年时期的信仰作为贯穿巴金一生的思想主线。林贤治基于史料,论证了巴金从青年时立志成为社会活动家的革命理想,到中年创作中对理想社会的呼唤,再到晚年的忏悔与反思,无不体现着这一思想印记。

此外,林贤治还选择从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切入,深入剖析巴金

敏感、脆弱、沉郁、多思的心理特质及其对创作的深层影响。巴金青年时期的浪漫激情与英雄主义情结,催生了《灭亡》“激流三部曲”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而中年后生命能量的变化与时代环境的剧变,使其创作转向《第四病室》《寒夜》的迷惘与沉郁。林贤治看到,从社会批判家到小说家的转变,是巴金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他的思想始终处于流动与重构之中。

巴金中年至晚年的精神转型,亦是书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林贤治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巴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写作历程和精神世界。他通过大量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比较、证伪、猜想,还原了巴金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真实心境和精神空间。

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巴金,受困于时代与家庭的捆绑

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到小说家;从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人……在书中,林贤治褪去历史赋予巴金的标签,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矛盾却更真实复杂的巴金。

巴金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思想的流变中,也体现在他与家庭、亲情、朋友的关系中。作为封建家庭的“叛徒”,他年轻时毅然离家,投身于文学与革命;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他却又不得不承担起“家长”的责任,照顾亲人、维系家族。这种从“出走”到“回归”的转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源于他对“家”的依恋、一种深植于文化血脉中的伦理本能以及时代与命运的双重挤压。林贤治在书中以大量细节呈现了巴金

在理智与情感、思想与行动上的矛盾与无奈,这种“挣扎”贯穿了他的一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仍写道:“我还要挣扎……”

林贤治将巴金拉回到“人”的位置。书中写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与吴朗西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合作到分裂的全部细节,写到了巴金的沉默与忏悔,写出了他在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分裂与统一。尤为动人的是林贤治对巴金与妻子萧珊关系的书写。萧珊不仅是他的爱人,更是他精神上的知己与支柱。在艰难时期,正是萧珊的温柔与坚韧,让巴金得以在沉默中感受温暖。萧珊病逝后,巴金陷入长久的悲痛,这种丧失感也成为他晚年反思的重要动因。

一幅精神图景,追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巴金的一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的起伏,更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激流中的共同命运。林贤治在书中写道:“所谓‘命运’,它不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是个人与时代互动的结果。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则是集体人格与时代互动的结果。”

《巴金:激流一百周年》以巴金为轴心,串联起鲁迅、曹禺、沈从文、丁玲、冰心等一代文人的交往与命运。作者不满足于罗列事件,而是深入分析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选择与代价,对他们的不同遭遇进行了客观的叙述。在时代的剧烈变革中,他们或抗争或妥协或坚守或迷茫,每一种选择都折射出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的深刻交织。

其中,鲁迅对巴金的影响是巨大的。书中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以鲁

迅的批判精神为参照,凸显巴金自省精神的独特价值。他回忆自己没有站出来替沈从文讲话时,说:“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他坦言自己欠下的债太多,晚年的一系列挣扎反思,都是他直面历史创伤、自我忏悔、坚守文学良知的体现。可以看到,鲁迅的批判精神、反思精神,是巴金毕生的精神指引,也使他成为鲁迅精神最优秀的继承者。

在书写巴金的过程中,林贤治通过分析巴金思想转变与时代变迁的内在关联,探讨社会变革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追问文学在动荡时代中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引言中强调:“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地比较、证伪、猜想与反驳,重构巴金以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